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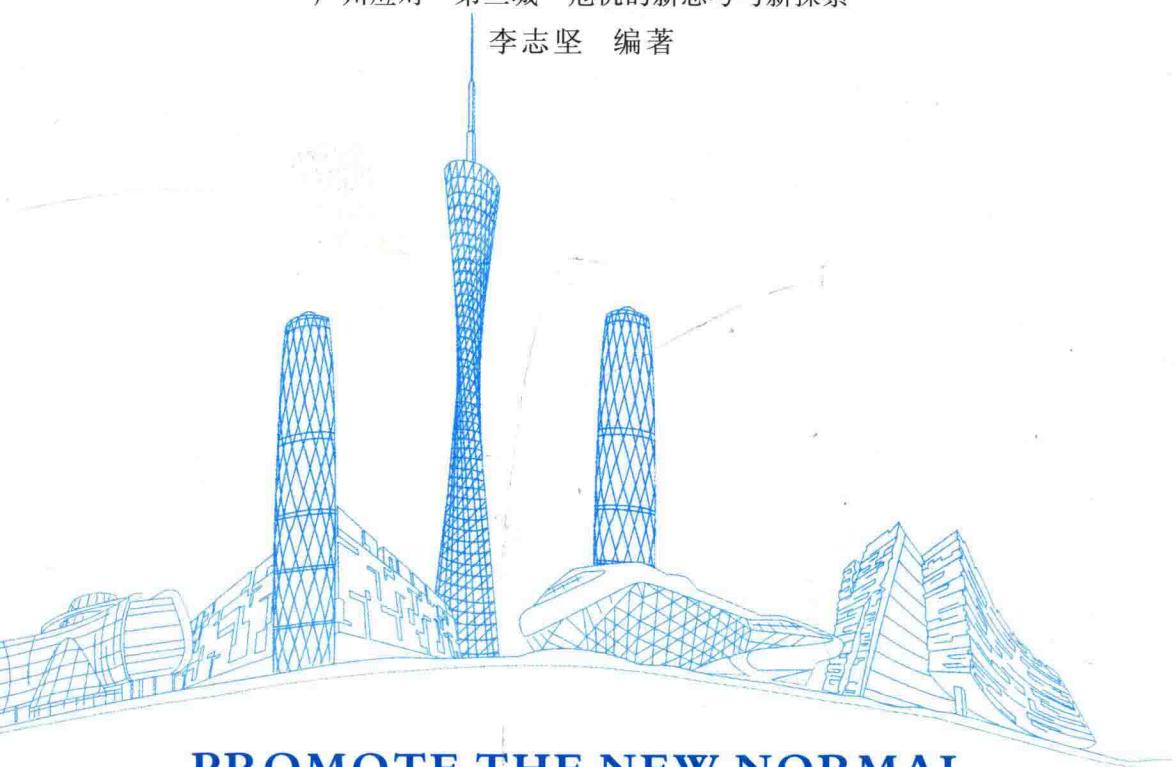


APER
亚太经研院

助力新常态 新经济模式下广州发展新战略

新型智库领军人物解读新常态下产业新业态发展
著名留学归国企业家分享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经验案例
广州应对“第三城”危机的新思考与新探索

李志坚 编著



PROMOTE THE NEW NORMAL
GUANGZHOU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THE NEW ECONOMIC MODEL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助力新常态

新经济模式下广州发展新战略

PROMOTE THE NEW NORMAL
GUANGZHOU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THE NEW ECONOMIC MODEL

李志坚 编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助力新常态：新经济模式下广州发展新战略 / 李志坚编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7
ISBN 978 - 7 - 5454 - 4097 - 3

I. ①助… II. ①李… III. ①城市发展战略 - 研究 - 广州市
IV. ①F299.27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3170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吉山村坑尾路 3-2 号)
开本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32 000 字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 - 7 - 5454 - 4097 - 3
定价	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020) 38306055 37601950 邮政编码：510075

邮购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020) 37601980 营销网址：<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微博：<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编委会成员

主任 李志坚

副主任 董小麟 罗秀豪 徐印州 郑天祥 李新家 骆雪超
编 委 张丽娟 周小兵 李启华 江丽鑫 张志明 刘 卉
邓振宁 蔡兴燕 陈正东 姜旭毅 许 晓 申伟雄

主 编 李志坚

副主编 李启华 江丽鑫
执行编辑 李小磊 王 倩 胡 益 程 煜 冯洁梅 刘胜强
编 辑 钟燕芬 陈 明 程玉琴 江 锦 张 爽 黄 倩
樊建锋 汤嘉伟 李楚洁 周柱豪 王纯洁 黄飞霞
司徒萌生 叶茂桂

序一

新常态与新业态——客观的态势与主动的作为

董小麟

2014年以来，“新常态”的概念很快成为描述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态势的一个“关键词”。从中央领导人对这个词语赋予了中国特色的发展内涵，到当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它的全面诠释，社会对它的认知程度的普及和提升之快，可能是以往很多官方倡导使用的新概念的推广效率所不能企及的。

认识新常态，是为更好适应新常态；而要适应新常态，显然不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主动的；而优秀的新常态的驾驭者，则不仅会主动适应它，更会成为新常态的“弄潮儿”，以助力新常态。因此，摆在读者前面的这本书，就是试图为所有乐于更好地把握新常态的人们，提供从理论到以广州为蓝本的实践研究的读本，以冀引起对中国新常态与新业态的更充分的研究与探索，以求取得中国新常态下更好的发展效果。

一、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态势

(一) 从哲学意义上认知新常态的必然

新常态这个词，从语词的构成看，也就是“新”的“常



态”。所谓常态，是事物运动发展中状态相对稳定的阶段或过程，它区别于突变性的因素多发的阶段，并遵循着一定的秩序，在比较成熟的相关规律系统支配下运行；所谓“新常态”的“新”，则体现该种常态是区别于此前一个阶段事物运动发展所呈现的另一种状态，是事物运行规律随着其赖以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基础变化而变化的过程，是破除旧秩序而形成新秩序条件下的事物所获得的新的存在与发展方式。

新常态这个新词，最早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的2009年被美国人提出的时候，多少带有一定的无奈和消极，他们只是想以此描绘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下行的态势及所伴随的波动和对民生的影响，并不包含人类的积极作用。

从社会科学的范畴看，没有任何概念可以脱离人的存在而存在，毕竟社会是人的集合体，是人及其行为构成的系统。美国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及其随后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危害或无奈也促使人们采取制度变革与观念变革来获得走出危机的机会。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所不可脱离的规律，当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状态（常态）逐渐难以维继的时候，新的常态必然要取而代之。而人类与恐龙之类的本质区别，恐怕就是能不能适应并驾驭新的常态，使社会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平台，进入新的更好的一种存在与发展方式。

所以我们说新常态是哲学意义上的必然，哲学的原理已经为我们呈现：规律运动必然是顺应其存在与作用的基础条件而变化的；况且从认识论意义上的“必然”与“自由”看，“自由”还只是一种终极的企求，我们今天依然要遵循“必然”，更好地认识和适应新常态。

（二）新常态是中国发展中的必然

纵观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自公元5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保持了连续十四个世纪全球经济总量第一的地位；但晚清封建王朝的腐朽和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迅速衰落，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绝不愿意使这种衰落成为一种“常态”，他们经过前赴后继的浴血抗争，终于使自己重新站起来；再经过数十年的艰辛探索，终于重新赢得了自己国家在国际上和平崛起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增幅远超世界增幅的一倍以上，我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百分比又重新升至两位数的水平。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中国的特殊性去观察，通常一个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一个较高速发展的成长期，这个阶段的重要特点是工业增长速度领先于国民经济，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向工业集中，带动经济总量加快增长；同时由于追求速度的观念制约和技术进步相对滞后的制约，往往在高速度增长中伴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城乡二元分割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若解决不足，最终又会造成增长的局限，形成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世界银行所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跃上一个平台以后很容易陷入的一种徘徊式发展的“常态”，这对中国是一种警示。中国应该避免这种相对停滞“常态”的出现，而着力促使经济社会走上新的稳健的发展道路。

对于一个人口第一大国而人均战略资源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在实现经济起飞以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客观的需要，旧的发展模式必然要被新的模式所取



代，尽管我们现在每年的净增长额已经是改革初期的许多倍，但增速的减缓则是规律作用的使然。今天，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领导人与学者们的基本共识。

与最初说到新常态概念的美国人不同，在中国人的词汇里，我们说的新常态，更多的包含着正能量，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圈子内原地踏步。在中国，随着我们对自身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增强，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上给新常态概念做出了全面刷新，赋予了新的内涵，使之不仅体现对当今国内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客观趋势的反映，更是体现了中国发展的新理念、新作为。因此，我们的民族将乐见这样的新常态，将按照客观规律去迎接、参与和助力新常态。

二、新常态及其与新业态发展的关系

(一) 新常态的要素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开幕式的演讲阐明了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发展的新常态，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但其内核至少包含以下要素：

1. 观念刷新。新常态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必须以刷新发展观为条件。新常态下的发展观，不是意味着消极接受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是在结构优化中积极发现和寻找新的增长点；不是意味着被动接受国际市场形势低迷的制约，而是在积

极创建21世纪“一带一路”中获取共赢的商机；不是意味着简单接受投入的资源约束，而是设法改变和优化投入结构而创造新的“红利”之源。

2. 速度略缓。新常态要求改变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换取高速度的路子，但并不简单否定速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加大，在更大基数条件下，存在放缓速度的雄厚基础，在增长率有所放缓的同时，经济绝对量的净增长额仍然可以保持显著增长；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幅的适当调低将保持在可控制可承受的范围内，保持在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的范围内，以便保障在每年新增人口基础上的全体人民的民生改善。

3. 结构理顺。新常态追求的是以结构的优化换取效益的提升。例如，在产业结构上，将收缩长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高新技术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消费结构上，从主要满足民众物质生活需要转向包括文化需要在内的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多样性的需要；在区域结构上，大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通过消灭县级以上贫困地区而达致人均经济总量指标符合全面小康的条件，而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是其重要的步骤。

4. 动力更优。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其投入要素的结构将发生变化，因而其动力源将得到优化。在这里，投入的减与加存在着辩证法。一方面，我们要实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对原材料、能源、土地资源的投入需要严格控制，对一般劳动力的投入也要因应适龄劳动人口的数量的变化而趋于节省；但对科技、教育与智力服务，对农业和农村，对市场欢迎的新业态，其投入恰是需要增加的。所以，简单说减少资源投



入，是片面的，因为科技、人才等等，都是资源，都需要加大投入力度。

（二）新业态的发展是对新常态的助力

新常态的出现，带来的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迁。在经济领域，不仅有要素组织与要素投入方式的变革，有消费对象与消费方式的变革，同样有生产与流通运作方式的变革，如此等等；而且这些变革将形成对新常态的塑造，构成对新常态运行的助力。

新业态是新常态运行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解读新常态的9个要点中，继关乎启动内需的消费方式变革后，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列在第二点，体现了对新业态等与消费环节衔接紧密的生产与流通方式变革的高度重视。

新业态的概念，当然是相对旧业态而言的。所谓业态，简言之，是产业组织形式的市场表现。业态的变迁，可以受技术进步影响，比如电脑的运用，改变了许多生产与销售在市场上所呈现的形式；可以受管理方式的影响，比如，连锁经营的方式拓展了商业化组织实现规模效益的路径；可以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不同文化氛围的民族和社区，对不同业态的接受存在某些差异；还可以受制度设计的影响，比如一国法律或政策对某些业态的支持、鼓励还是禁止、约束等等。

在我国，新业态的发展，一方面是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发展的，比如打破条块分割的传统体制约束后，跨区域、跨行业发展的业态逐渐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社会化、市场国际化而发展的，比如国外的先进业态进入我国，以及技术变革促进自身业态的改造等等。所以，改革与创新，再加上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能够发展新业态的核心动力源。

发展与用好新业态，是对新常态的助力，这是基于以下的认识：

新业态对激活和拉动消费，促进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具有重大作用。比如电商业态所拉动的消费，近年来保持着高速的增幅；新业态对流通方式的改造，压缩了物流环节，提高了产—销对接的速度和效率；新业态对投入要素的结构的改变，更多借助智力、科技和虚拟空间，减轻了对许多物质要素和实体空间占用的依赖；新业态往往给中小企业创新以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增强了中小微企业市场博弈的能量，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秩序的形成；新业态增强了企业的供给能力，完善着企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路径，从而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对民生改善发挥积极作用……

三、推进新业态的发展需要多元助力

新业态之所以“新”，就是它是在创新中形成与发展的。作为智慧的中国人，作为拥有世界最大数量的经营者的中国，不仅要敢于善于学习和引进、运用来自国外的新业态，更要敢于善于在自己的创新中，缔造新业态。

新业态的发展，需要多元的助力：

（一）以科技创新助力新业态

科技进步是新业态发展的重要推进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离不开科技进步。特别是进入当代以来，科技进步的加速度趋势使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呈现前所未有的迅速更替，过去在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之间都没有明显变化的生产经

新业态，在今天却表现为业态的代际更替速度空前加快。就如科技进步加快了产品的新陈代谢，令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缩短一样，科技进步也加速了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兴盛，以致使各类业态的平均生命周期出现缩短的趋势。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的信息技术的进步，正在不断深化地改造着设计的理念、生产的手段、流通的形式、消费的路径，从而塑造着与时俱进的新产业、新业态。所以，我们要不懈地加强科技创新，让我们的新业态的发展获得足够的技术支撑。

（二）以制度创新助力新业态

制度创新对新业态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改革让我们从过去传统体制的条块分割、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排斥市场的格局中走了出来，从企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集聚方式，从纵向的产业衔接到底向的合作发展，从商业业态的多元竞争到消费选择的机会均等，大批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功不可没。仅从流通领域的零售业态看，在中国内地，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超级市场，到90年代的连锁商业，再到21世纪初的综合商业体和当前的电商贸易，每一波业态的大变革和新业态的大发展，都带来市场的新的繁荣，而这些变革，既是顺应商业业态内在变化的规律，也与国家出台相应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指导分不开。所以，当前助力新业态，依然要借助体制机制的改革。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商事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新的市场经营主体的涌现达到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这同时给新业态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以管理创新助力新业态

管理，在中国作为一个被划定的学科门类，还不到20年的历史；所以，中国的企业管理的现代化，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

程。目前一些企业或行业管理混乱，影响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信心，从客观的历史进程看，这些混乱也是欧美国家曾经长期经历过的，但我们仍然需要正视和加强纠偏。通常，一种新业态出来，往往令投资者经营者趋之若鹜，特别在一些原有固定资产包袱不重的行业，转入新业态的速度是很快的。与此同时，社会对新业态的准备似乎尚显不足，法律、制度往往存在一定空隙，因此，强化管理实属必要。比如目前电商行业发展迅猛，其间难免鱼龙混杂。如果对于新业态过于投鼠忌器、过于放任，则容易败坏其声誉，而一旦从企业声誉到行业声誉全面受损，就无异于对一种新业态的扼杀。所以，管理者，从企业、行业到政府的管理者，就需要研究新业态的问题，搞好管理，帮它“除虫”、“除草”、“施肥”，使它能够长得更茁壮。

（四）以文化创新助力新业态

创新，首先是一种观念，而观念属于文化范畴，新业态的发展最终需要文化的助力。一是需要赢得目标市场的文化助力，企业在打造新业态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吃透其面对的市场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是营销学家普遍认为的最难以测定和嵌入的环境；盲目跟风移植的新业态，有的中途夭折，往往是不适应该区域或该目标顾客群的价值观与文化诉求。二是要建立所开发的新业态的独有的文化竞争力，当一种产品和一种业态，具有独特而有魅力的文化吸引力的时候，它的市场地位就会更加稳固。三是新业态的经营者要激活和引导消费文化，创新消费观念，这是供给方的重要责任，就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说：“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这样，整个社会的内生的消费活力，就通过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而得到激发，进而带来生产与

供给方式的变革，带来生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这对社会发展进步的经济基础将构成持续的贡献。

2015年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新兴产业和新业态是竞争高地”，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相信，本书带给大家的是对新常态与新业态的一种新的研究探索，而实践之树常青，今后将会有更多这方面的实践及其理论上的升华，我们将乐于见到更丰富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的涌现。

2015年3月

(作者系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序二

创新为广州增添不竭的发展动力

徐印州

在新常态下广州如何发扬传统优势，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是身居广州的民间智库必须回答的问题。由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编写的《助力新常态：新经济模式下广州发展新战略》就此问题建言献策，做出了一份有益的答卷。本书汇集了许多业态创新的案例与经验，对广州市各类产业的业态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且涉及业态创新的理论问题，既有现实的实用价值，也具一定的理论意义。业态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其本质是创新，而创新驱动才是新常态下保持城市经济活力的必然选择。所以，我想利用为之作序之机，就创新谈一谈自己的管见。

一、广州是一座极具创新活力的城市

广州是一座具有2200历史的文化名城，广州又是一座充满创业活力的“最佳商业城市”^①，体现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大优势。现在广州正朝着“国际商贸中心、世界文化名城、

^① 2014年，广州第4次荣登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首。

国际航运中心和华南交通枢纽”的定位迈进。

为什么广州屡登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首？对其深层原因的解读虽然见仁见智，但是的确有一些解读存在明显的偏差，以为“最佳商业城市”的荣誉仅仅是对广州商业本身的评价和褒奖。主要的误读有二：其一是对“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名号中的“商业”的理解局限在狭义的“商贸流通业”，以为广州就是因为千年商都的商业传统、浓郁的商业文化气息、现代化的商业设施以及巨量规模的商业交易，才获得福布斯“最佳”殊荣的；其二是低估了这项荣誉对城市经济评价的根本意义，其实这项荣誉是对广州城市经济活力的整体评价，是对广州营商环境的全面评价。

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以中国国内65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并对前一年GDP超过360亿元的132个城市进行了基础数据搜集和研究。福布斯中文版通过反映城市商业活动及决定未来发展所要素的指标体系，即人才指数、城市规模指数、消费力指数、客运指数、货运指数、私营经济活力指数、经营成本指数、创新指数等八项指标，综合观察中国大陆城市的发展潜力及商业环境。其中创新指数、消费力指数和城市规模指数是2010年新增加的三大指数。

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商业竞争力决定一个城市的前途。福布斯年度最佳商业城市排名，并不考虑一个城市的长期历史，观察的是一个城市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进步，更看重城市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看重一个城市面对不断发展的多变市场而日益完善的营商环境和与日俱增的经济活力。2010年广州首次登上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排名榜首，2011年接连获此殊荣，2013年和2014年蝉联榜首，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之间百舸争流的

竞争态势，以及广州城市竞争力的演变。

广州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必定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商品流通中心和商品生产基地，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完善的商品流通体系、信息交换系统、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强大的物流集散与辐射能力，同时也是全国性的商品消费中心。与之相应的，广州还具有集中的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当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强力支撑。白云机场扩建后客流量突破新高，广州港三期工程以及广州段铁路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使货运吞吐量明显增加，这些都是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排行评估的加分项。广州在客运、货运指数方面排名第一，占据绝对优势，人才指数、消费力指数、创新指数也都排在前十位，经营成本相对降低。福布斯认为，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中，传统的招商引资及土地开发经营正在弱化，而创新与创业正在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广州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宜居、宜商、宜业三大方面。

宜居：广州是一个全方位的宜居城市。广州城市经济持续繁荣，经济要素高密度聚集，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产业结构和强大的发展潜力，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能为城市物质设施建设提供充分的保证。广州的社会和谐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团结、各阶层融洽、社区亲和、城乡协调发展，公共安全度高，现代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居民安居乐业。广州的城市文化氛围浓郁，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厚重，图书、文博、音乐、体育、会展等设施齐备，高雅文化与民俗文化活动频繁。广州依山傍水，自然景观优美怡人，城市生活舒适便捷，2015年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将达16.5平方米，城市绿化率全国排名第三。公共交通网络发达，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教育、医